

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一天，我已记不清具体年月了，只记得市文化部门组织一批作者到武汉市青少年宫参加活动，有一项活动内容是签名售书。

我和大伙在几条长桌拼成的签名售书台前排排坐。这一天来青少年宫的人非常多，同时举行的还有一场帮助下岗职工找工作的赶集会。

我们的面前，看热闹的挺多，买书的很少。太阳很好，作者们就坐在那里边晒太阳边聊天。

这时，我的桌前来了一个小人儿，在我面前放了一件东西。我好奇地发现，是木制玩具车，虽然做工不算精细，但有模有样的，挺好玩。刚想喊一声“小朋友”，定睛一看，对方是一位身材酷似孩童的中年男子。他笑眯眯地说：范老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完全不记得在哪儿见过他，无端受人礼品真是不好意思，我慌忙站起身来，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推托了半天。大家都劝我收下来，不要辜负对方的一片情谊。我无以回报，赶紧拿出了新书说一定要送他一本。男子笑道，他已在书店买了，今天只要我签个字，说着从胸前摸出一本还带着体温的书，我感动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我伏在桌上认真地签了字，写了一段祝福的话。

交谈中了解到，他今天也是到会上来找工作的，知道我来，特意在家门口买了一个模型车送我，因为我喜欢东奔西走。他说他也喜欢这种生活：“我要是能出去，人家只能收我儿童票呢！”显然，他还是一个乐观的人。

这时，扩音器里宣布招聘开始了，他匆忙地向我道别，很快，矮小的身影被汹涌的人潮淹没了。

我捧着那台木制汽车呆呆地坐在桌前，久久地沉浸在无法言说的感动与意外之中。

这台汽车模型一直存放在家里。有一天，我的八岁的小侄子汤姆发现了，问我从哪儿买的，我将事情原委告诉了他，小家伙说，我知道了，你是个白雪公主，所以有很多小矮人喜欢你。

我认真地摇摇头：我比那个善良的白雪公主差远了。

说实话，这事我一直非常羞愧，竟没有记住这个曾经温暖我的人的名字，也因此质疑自己的真诚。

我把内疚也告诉了小汤姆。那辆模型车置放在我的案头，虽然它永远也无法发动，但已经驶入我的内心深处，时时警醒着：不要忘怀在人生旅程中曾经温暖过自己的每一个人。



对于美，女儿有着独到的鉴赏力。今年 5 月“梵克雅宝，美之传承”典藏臻品回顾展在上海当代艺术馆揭幕。女儿观展后赞不绝口，竭力推荐我去看看。踏入展厅，面对一件件充满灵性的饰品和其背后一个个动人心魄的爱情传说，我仿佛经历了一次如梦似幻的心灵之旅。和女儿交流后我们都特别偏爱摩纳哥阿尔贝二世送给查伦王妃的定情信物——以大海波浪为灵感设计制作的海洋头冠和一枚小巧别致的鸭子钓鱼胸针以及那组以舞女和仙女为创作源泉的芭蕾系列饰品。

半年前我开始着手筹划注册诺贝尔奖博物馆网站，对注册名称一时颇伤脑筋，有过“中国诺贝尔奖博物馆”和“诺贝尔奖纪念馆”等名称的考虑，总觉得不妥，直到一次随意征询女儿意见，女儿想了想

建议干脆就叫“诺贝尔奖博物馆”。女儿的取名简洁清晰，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难题就不费破解了。那时我筹办的“世纪诺贝尔——获奖者题词、签名书、签名照片和邮品系列珍藏展”也已进入关键时刻。10 月 11 日晚，我与友人小聚，7 点刚过，女儿发我短信，仅四字：真是莫言。同桌友人知道后感



夜光杯

2012 年岁末，电影《一九四二》公映，它重现了 1942 年河南 300 万人死于旱灾、战争和政治环境的一段历史。由此我联想起父亲的 1942。他经历了八年抗战，记忆最深的也是 1942。

父亲断断续续讲述了他的 1942。日军侵入平津后，父亲参加了八路军。“在敌后，见不到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就剩我们游击队了。敌人强化治安，不断清剿，到 1942 年就更惨了，那年我 14 岁，已经当了 4 年兵；那年冀中大旱。旱灾死了多少人不知道，那年日本人的‘五大扫荡’，死的人太多了。”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急欲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为确保冀中安全，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集结数万兵力，从 1942 年 5 月 1 日起对冀中进行了历时一月有余的大扫荡，使冀中陷入“无村不戴孝，户户闻哭声，出门必过路，夜观岗楼灯”的惨境。

“我们的部队几乎天天打仗，天天死人。有一次，我们一个连一百多号人打得就剩了 7 个战士。”

“我见过我们的战士跟日本人肉搏。开始，敌人呀——呀——地冲上来，我们的战士也喊，可那声音都变调了，就是那种人在拼死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初期的日本兵训练有素，他们头戴钢盔，都

慨道：“知父莫若女，你女儿学校里这时如此关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也许就她一人。”回家女儿见到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爸，你有莫言的签名书吗？”当我从书橱中找出一叠莫言的签名书后，女儿似乎这才

芳树无人花自然

南窗雨

放下心来。女儿是真的长大了，原来大大咧咧的她开始知道关心父母了。今夏“海葵”袭击上海，我在公司上班。停课在家的女儿知道我的办公室在超高层大楼内，担忧之下发来短信：“老爸，请你呆在室内啊，海葵现在正在上海市区了啊，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啊，很多东西已经飞起来了，砸到人就不妙了啊。”读着短信，心里暖暖的，至今没有舍得删掉。

先生出生于农村，家里兄弟姐妹众多。生孩前，就早早商量好让他父母来家里照顾我坐月子。可是公婆、婆家年纪已高，怕照顾不了我和孩子，于是，又决定带先生大姐家的女儿前来帮忙。这样家里一下子要增加三口人，对于一向喜欢安静的我，实在是有点害怕他们的到来，可是又没别的好法子。

在我生娃前几天，他们先到我家住下。可是来的不仅仅是他们三个人，还多了个“不速之客”——先生哥嫂七岁的女儿亚亚。我坐月子正值暑假，亚亚在家没人照看，她妈妈干脆让她跟爷爷奶奶一起来到我。我心里自然有些不痛快，是的，他哥的孩子暑假到我家玩没有错，可是，毕竟我在坐月子，需要安静的环境，家里多了这么个小人，还得时时有人看管她。可是，人都来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待我生完宝宝从医院回到家，只得硬着头皮接受家里一下子激增五口人、人丁兴旺的现状。家乡有句俗话，“七岁八岁狗都嫌”，亚亚这孩子果然不让人省心。我白天在房间睡觉，她在客厅看动画片，声音开得叽叽喳喳吵死人。婆婆于是把电视关了，她大哭大闹好一阵

父亲的一九四二

罗雪村

有刺刀，可我们好多战士没有刺刀，也没有几颗子弹。他们就拿枪把抡、拿石头砸，拿大刀砍，用牙咬。有个会武术的战士，连着砍倒了 3 个鬼子，结果他挨了几枪，没死，最后突围出来。我问他疼吗？他强笑着说：‘没关系，我好赖够本了。’我说：‘政委让我来慰问你，可我什么也没有，我就给你唱支歌吧！’我唱了一首《八百壮士》。他说：‘抱歉了，我鼓不了掌了。’他让我给他点支烟。然后说：‘小罗，我也给你表演一个节目，叫七孔冒烟。’说着，他猛吸一口烟往肚里一咽，立刻，他胸前缠着的绷带下面就真的冒出了丝丝的烟来，那是从他身上的伤口里冒出来的呀！我哭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个样子。”

也是 1942 年，父亲因年龄小被暂时借住在献县方周村段大娘家。他曾亲眼看见敌人进村把人绑在梯子上吊着头灌水，当街强奸人，完了就杀掉。

“扫荡过了，形势仍然很乱，到处都是敌人。一天，段大娘悄悄告诉我，说有人来接我回部队。

很快，段大娘家来了一个人，个儿不高，瘦瘦的，留着个分头；穿条黑裤子，用黑带子扎着裤脚，脚穿千层底的鞋，戴个礼帽，还戴副墨镜，斜挎个盒子

想着女儿不久的将来多半会去国外留学深造，也就有了让她学点中国绘画的念头。征得女儿同意，从今年暑假开始她正式每周一次随著名书画篆刻家吴颐人老师学习绘画。吴颐人老师在闵行区少年宫工作多年，不仅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为人厚道，擅长传授画艺。几个月下来，在吴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女儿画艺渐长，也能像模像样地画竹、荷花、青蛙、小鱼和虾了，尤其是她画的竹劲健有致，深得吴老师的夸赞。为了培养女儿学好绘画的兴趣，吴老师还特意请自己的学生专门为女儿刻了一套姓名章和闲章。在吴颐人老师的循循善诱之下，女儿开始慢慢喜欢上了绘画，这可是我未曾料到的。

在父母的眼中，儿女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正因为如此，我们想让孩子“远走高飞”也许是个明智的选择，至少可以让她快快成长起来。

子，好不容易才被哄住。过一会儿，我好不容易睡着，只听到她穿着我的高跟鞋咯噔咯噔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到了晚上，听婆婆说洗脸池下水道堵住了，水也排不了，我走过去一看，只见排水口处被塞了好些橡皮泥，导致下水管堵塞，原来是亚亚倒的。我费了好大劲才一点点地把它们抠出来，然后，就批评了亚亚

家里的“不速之客”

梅莉

几句。小家伙一听不高兴了，吵嚷着要回家。公公婆婆说回家没人带你，你爸妈上班了，你还是乖乖地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吧。

坐月子的时候，我是严重欠睡。夜里的睡眠被宝宝扯成一片片的，白天又被亚亚搞得不定心。有天吃饭，忽然看到亚亚的嘴唇又红又肿，大吃一惊。赶紧问她嘴唇怎么啦？婆婆说，亚亚偷偷地拿我的口红画了一嘴一脸后，嘴就肿了。打电话跟先生发牢骚，说他不应该让父母把孙女一起带过来，这孩子太让人

枪……那打扮真像个特务！我问他叫什么？他瞪我：‘你问这干什么？’‘我不认识你呀？’他说：‘你要是认识我就麻烦了。’他说：‘快！跟我走！回部队去！’他给我一个包袱，里边有一颗木头柄手榴弹。他让我挎着包，弦在手指头上拉着。他叮嘱我：‘碰到敌人别吭声，我来打

发，过去咱就过去了，如果他耍玩儿硬的，你就拉弦，咱就跟他同归于尽。’”

“我们朝河间方向走。路上，看见地里的蚂蚱一片一片地。俗话说，旱出蚂蚱。那年旱得厉害，正闹蚂蚱，一趟满地里，‘哗、哗’的起蚂蚱。我说咱速点蚂蚱吧，我就脱了小白褂，一兜就兜了一兜子。

一路倒是挺安全，在一个路口碰上日本人，他会说点儿日本话，叽里咕噜说了几句，那个日本兵一摆手，把我放过去了。我那个手榴弹，就在挎包里勾着，一暴露就打算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终于进了白洋淀边上一个叫菜圃台的村子，突然暗地里窜出一个便衣，是部队来接应我们的侦察员。他扒开一堆棒子秸，领我们钻进一个土夹道，钻来钻去就钻进一间屋里头。只见土炕上，坐柜那，纺车边上，坐着站着一屋子人。哎呀，我那个高兴呀，止不住地哭。又见到我们的人了，真跟孩子见了娘一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我半路上在地里抓了一兜蚂蚱，咱们炸蚂蚱吃吧！正好灶台那烧着锅，已经蒸好了一簋子窝头。我就把蚂蚱一股脑倒进锅里，热油一炸，撒点盐，嘿嘿，真香……”

父亲平静地回忆了 1942 年他亲历的中国人那段苦难岁月。

父亲非名人，也非官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像那个年代万千中国人一样，经历了太多生生死死。苦难锥心刺骨，不会遗忘，所以会有《一九四二》，所以会留下许多像父亲这样的回忆。对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中国人曾经的苦难永记于心，并告诉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们。

操心了，弄得我月子也坐不好。我本以为，他一定会站在我这边的。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在电话里反而责备我，说亚亚是他哥家的孩子，来我们家玩儿难道不应该吗？我愣住了，愤怒地说，那好，我明天就带宝宝回娘家坐月子，让你们家人住在我家好了。当然，这是气话，我最后并没有这么做。

无奈我就这样坐了一个不消停的月子，现在回头想想都是些小事，我的孩子和亚亚一样长大许多，亚亚和我也很亲。

事实上，坐月子期间的女人还是需要休养的，因为身体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家里人最好能营造安静舒适的环境。若是平时，家里多来些亲戚，热闹一下绝对无可厚非，我也十分欢迎，只是坐月子的时候，还是希望全家上下能尽量体谅一下产妇的心情，多些照顾理解，少些打扰为妙。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连续三年举办百联杯“十佳”优秀社区民警评选活动，明起刊登一组《马天民新传》，介绍社区民警为民排忧解难的故事。

下了 905 客运，转进回家的路，脚步顿时轻快起来。村子里很安静，除了两旁住家透过窗口的柔和灯光，就是电线杆和油加利树下投下的影子了。

住在这里近五十年，最早巷口的中正路是一条窄长田埂，遥遥通向北路，朴实的农舍和一亩亩青色稻禾，是当时的乡村景象。

时代变迁，如今早已改头换面，平整的柏油马路两旁，商店林立。暮色中，华灯初上，中正路有如一条灰腰带镶上了五彩钻，晶晶发亮；待暮色渐拢，腰带由珍珠

灰转油黑，五彩钻更加闪烁；加上四通八达的客运呼啸而去，附近学校的书卷味儿混合着夜市蒸发的食物香味儿，中正路俨然成为新店市的星光大道。

“炎明新村”不一样。炎明新村虽然位在中正路的心脏区，却是闹中取静，活像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成天端把旧藤椅坐在巷口看风景——春天，轻轻拂面的凉风；夏天，让人窒息的高温；秋天，不知打哪儿飞来的落叶；冬天，热气腾腾的涮涮锅小店；当然，还有数也数不完的路路车、摩托车、轿车、货车、公交车和游览车；男人、女人、小孩和老人；抱着猫咪的漂亮小姐和牵狗溜达的老公公在过马路，提着菜篮的老婆婆买鱼又买肉……中正路每天上演不同的戏码，只有“一甲子”的炎明新村，以“耳顺”的姿态，偏安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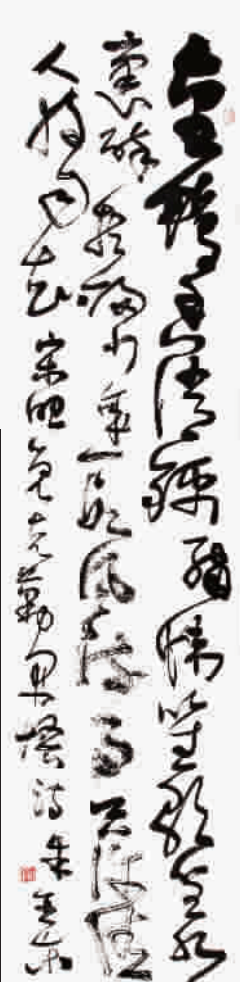
村里有四十几户独栋人家，各住各的。老实说，居住环境虽好，住的皆非富人。父亲是军人，“炎明新村”的土地原属国防部所有，顺理成章，就在这里住下了。不过当初我们住的房子并非公家配给眷村，地是公地，地上的房子却是私人自费的，父亲买下旧房子，我们一家四口便安居在此。搬来新店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到如今，父母双去，妹妹远居，独余我一人。

早期，村子里住了不少父亲辈的同事，但因为房子可以自由买卖，进进出出，也迁进不少“各界人士”，父亲这一代人陆续凋零，更加复杂的住户关系使得村子的重建协商迟迟无法解决，暂时的幸运让它至今仍在夹缝中生存，否则，房子被改建成魔术方块似的高楼，如人像像“东西”一样塞进“置物箱”里，该是一件多么难以呼吸的事啊！

我住村子中段，下车走进巷子，回家顶多五分钟。我总是慢慢地走，走得很珍惜，真心希望它永远这样留驻。走在十月的树影下，抬眼望向中秋的夜空，弯弯的月儿这时正在夜海中浮沉，轻飘飘的很是惬意；一阵浓郁的花气袭人，原来是对门邻居栽种的一大排七里香传达过来的。

这家主人阿巴哥脾气挺大，壮年时经常在家扯着嗓子骂小孩，粗声粗气十分火辣，我看见他，总不自觉地低头快步。二十多年过去，年岁大了，又添了两个可爱孙子，脾气改善不少，家里不但养了雄赳赳的大公鸡、优雅稳静的灰鸽，还把心思放在植物和盆栽上，门里门外，红花绿叶，煞富生气。紧接又听见一种熟悉的粗哑家禽声，伴随着另一种生疏的、但更粗哑的破锣声，我不禁睁大眼睛，这才赫然发现，阿巴哥二楼加盖的铁皮屋外，挂着一只巨型鸟笼，里面新来一只光华四射、天仙般的孔雀，那可不可思议的破锣声，赫然是从它嗓子里发出来的！

时间姥姥也许真的听见我的祈祷词，她让老村子紧紧拽住裙脚，尽可能远离红尘……往门前老树墩上一坐，重温“农家乐”，是多么惬意的幸福啊！



草书 朱亚东